

文匯講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4 年 12 月 20 日 总第 81—5 期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文学与我们的生活”第五场

报名、话题网页: <http://www.whb.cn/zhuizhan/jiangtang/>



文学季采编团队:

黄相宜 张贝思 陆红平 马栋子 李志秋 左京

整体设计:夏莉佳 视觉音频:袁圣艳

文学的变与不变



韩少功
主讲嘉宾

现任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

1953 年生于湖南。1978 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社长等职。

1974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1985 年倡导“寻根文学”，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日夜书》影响广泛。散文随笔《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等在当代独树一帜。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曾多次获境内外奖项：1980 年、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 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第二届、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

新的困难与新的可能



王晓明
主讲嘉宾

现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5 年生于上海。1977 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本科，1979 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许杰、钱谷融教授。198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

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化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著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编著有《现实主义的初潮——文学研究会作品选》、《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鲁迅：自剖小说》、《胡河清文存》、《人文精神寻思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等。译作《巨匠与杰作》等。

关于“寻根文学”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史上，1985 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虽然也出现了汪曾祺等作家所开辟的民间世界的空间，但个别人的创作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现代主义技巧和现代意识的出现虽然给了文学一种新的震撼，但随之而来的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建构正常的发展。而 1985 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

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

1983 年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 年 12 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

“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

由“寻根文学”作家创造出的审美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大都生发于作家主体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其中有一些作家，倾向于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这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通过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达出文化魅力，并以此完成了对一种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比如阿城，他的《棋王》、《孩子王》、《树王》都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棋、字、树，都

是中国文化中人格的象征，小说里的人物便在与传统文化的相融之中，实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又如张承志，他的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残月》、《九座宫殿》等，描绘北方的草原、戈壁、雪峰、江河，吟唱着古老的民族歌谣，刻画出彩陶碎片的美丽、清真寺的庄严……

除了这类对人格境界的审美塑造，“寻根文学”体现出的另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小说都带有这方面的探索意义，在《爸爸爸》中，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生存方式，用象征的方法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存的艰难过程。这些神秘的描写中显然都含有对生命奥秘的窥探。王安忆的《小鲍庄》则是在

社会背景及具体时空虚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写实的笔触，突现出封闭状态中农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朴的仁义道德作为小鲍庄村人的精神依托，呈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与民族文化构成之间关系的思考。

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程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尽管寻根派作家们还是深受“五四”知识分子精英传统的熏陶，他们在对民间的亲近中仍保持着极强的主体精神，也就造成了他们对文化之根的追寻中有着较多的主体幻想，因而很难说是已经达到了对民间的真正认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在“文化寻根”的倡导和发展中，已经开启了民间在当代文学中的还原过程。

撰文 黄相宜

越是意识到“新意识形态”背后的种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多样运作，意识到它正在应和并塑造今天的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文化研究就越要将其视作最重要的批判对象。

比方说，应该仔细分析“新意识形态”在哪些方面回避、简化甚至遮盖了现实，又在哪些方面夸张、涂饰甚至虚构了现实，正是以这样的分析，文化研究可以激活当代人被压抑的生活实感，帮助人们了解、质疑和把握复杂的社会形势。

再比方说，应该深入探究“新意识形态”从各方借力、迅速成形的奇特过程，既注意它如何从“全球化”制约下的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汲取养分，更剖析它与腐败的权力和“新富人”阶层的利益关系，揭示它如何因这暧昧的关系而获得庇护。

还比方说，应该特别注意“新意识形态”的诡异身姿：它摆出一副“边缘”的姿

态，却分明已经稳居“主流”的位置……一旦以这样的角度深掘下去，文化研究势必能揭示出“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活动的某种新的类型，进而向整个人类打破意识形态控制的持续斗争提供启示。

更比方说，应该着力清理“新意识形态”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活动的复杂联系，看在什么条件下，知识界曾经或依然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更要从反省这“新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其中有哪些在今天能成为我们质疑“新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也好，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学

术工作者也好，他要批判地分析和认识这个社会，当然首先是靠自己的精神倾向和生活经验，他不但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有敏锐的洞察力，更有大量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经验，将他和公众的遭遇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特别是中等阶层（学者大多属于其中）的人，似乎总是与其他的中等阶层的人士生活在一起，缺少与社会下层的血肉联系。一个这样的在精神上越来越狭隘的人，他很自然就会逐渐远离那些尖锐的社会和时代问题。知识分子或学者需要获得充分的信息，要依靠学术体制所提供的的多样的研究和交流渠道，包括需要时

间、人力和经费上的种种支持。可是，现在在这些方面的条件还很差，特别是当代社会研究，信息渠道不通畅，研究的途径非常少，其他方面的条件也不好，更不要说那些更内在的问题了。

总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我认为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人文精神十年祭》

今天的中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兴盛，习惯于经常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因而可以被记入“文学人口”的读者的总量，以及与之相对的各类文学作

品的纸本的出版数量，实际都是在增加的。当纸面的“严肃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中的份额持续减少的同时，这个文学世界的版图，却是在逐步扩大的。

也就是说，与此前近百年的情况并无根本的差别，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能量，依然积聚在文学的世界里。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营造者们，正和我有共同的判断，他们同样认定，至少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文学依然相当重要。当然，文学为什么重要，看法又大不同，他们是觉得，中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创意”，是在文学里面，而在这个时代，“创意”是最赚钱的东西。我却相信，当整个社会继续为了开拓适合自己的现代方向而苦苦奋斗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伟大的文学，如同十九世界的俄罗斯文学那样，提升和保持民族和社会的精神高度。

——《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

整理 马栋子

王晓明精彩论点